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明清小说论赏摭粹

孙一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明清小说论赏摭粹

孙一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小说论赏摭粹 / 孙一珍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203 - 0445 - 0

I. ①明… II. ①孙… III. ①古典小说评论—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663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兴芳 慈明亮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353 千字

定 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鹧鸪天 奉和贫字词

孙一珍

斗室蜗居世外身，不知今日何为贫。粗茶一盏陶陶乐，
淡饭三餐寂寂春。 厌扰攘，做愚人。书山瀚海觅甘辛。
构思伴影霜染鬓，泼墨挥毫或警尘。

作于 1989 年，实为 80 年代论文写作时的生活写照

（原载《中华诗词》第 1 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目 录

明 代 篇

《水浒传》主题辨	(3)
从比较中看《三国志演义》塑造典型人物的手段	(24)
《水浒传》艺术论	(39)
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	(57)
桂林一枝 昆山片玉	
——《侯官县烈女歼仇》赏析	(72)
谈《于少保萃忠全传》	(82)
《金瓶梅》的艺术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87)
邓志谟论	(99)
明代小说的横向胜揽与正名	(112)
明代小说的艺术观照	(134)
《西游记》的版本考证及其发展轨迹	(148)
各有千秋 一枝独秀	
——明末四部魏阉小说之比较	(169)
《型世言》校点前言	(184)
陆云龙评选学的时代意义	(192)
《寻芳雅集》并非《怀春雅集》	(208)

清代篇

《聊斋志异》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	(213)
蒲松龄的为人及其思想	(227)
评但明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257)
蒲松龄心目中的皇帝与妇女	(283)
一篇一境界 一花一精神	
——《聊斋志异》艺术技巧初探	(294)
《聊斋志异》与《搜神记》	(315)
《聊斋志异》女性的心灵美	(325)
从《富贵神仙》到《磨难曲》	(346)
炎凉世态的一面镜子	
——《胡四娘》赏析	(361)
漫笔《晚霞》的艺术美	(370)
浅论《聊斋志异》的艺术风格	(378)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	(395)
集咏楼赏析	(400)
蕉叶帕赏析	(406)
席方平	(411)
劳山道士	(417)
“寓赏罚于嬉笑”	
——《聊斋志异》的讽刺艺术	(420)

明 代 篇

《水浒传》主题辨

《水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小说，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众说纷纭。“文化大革命”前大多誉之为农民革命的史诗或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自从“四人帮”利用批《水浒传》搞阴谋以来，有些人却把《水浒传》贬为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截至目前，有的评论者仍把《水浒传》的主要人物宋江看成是投降派的典型，予以否定。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水浒传》的艺术实践出发，结合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作者的思想实际，进行分析、探索，以期对上述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估量，这对于廓清历史的迷雾，正确对待古典文学遗产，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水浒传》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它真实、具体地描绘了北宋末年鲁、冀一带崛起的一场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反奸抗暴的武装斗争。这支在斗争中逐渐壮大的人民武装，以梁山泊蓼儿洼为根据地，在晁盖、宋江等首领的统率下，共举“替天行道”的义旗，开展了一系列反抗奸佞、贪官的英勇战斗。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这场斗争从发生、发展到灭亡的全过程，深刻地暴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水浒传》写的是什么样的矛盾冲突

《水浒传》的作者，不可能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营垒分明地描写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也不可能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判断是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水浒传》，不等于生搬硬套地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框子要古人就范。从小说的实际出发，它是从“官逼民反”入手来展示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起义的。这里所指的“民”不限于穷苦农民。我们从作品中看到许多庄园主，像宋太公、晁盖、柴进、李应、孔太公、穆太公、毛太公、祝朝奉等。其中除祝朝奉为专门与梁山泊作对的反动武装头子，毛太公是欺骗解珍、解宝的恶霸外，大多数庄园主都先后上了梁山。看不出这么多地主与庄客、长工之间有什么尖锐的矛盾；相反地，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庄客都是以庄园主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笔下的农民同一般地主的矛盾并不那么突出。

从百回本的《水浒传》全书着眼，它所写的是亡国之君宋徽宗统治时期，蔡京、高俅等贪官、奸佞、权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冲突。其中包含着强暴对弱小的欺压，奸佞对忠良的排挤，邪恶对正直的陷害。小说鲜明的倾向性在于歌颂那些敢于向强暴、奸佞、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英雄豪杰，并且巧妙地指出强暴、奸佞、邪恶势力的总后台，便是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宋徽宗的身世和特点，他“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宋史》中关于宋徽宗赵佶宠信和骄纵蔡京、童贯等奸臣、宦官也记载分明。童贯、杨戬等宦官为了“求上宠媚”，从全国各地罗致大量的珍贵木材、奇花异石，运往京城，名曰“花石纲”，连“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的都不放过。多少人家为此卖儿鬻女，家破人

亡。蔡京等趁机搜刮，奢侈无度。蔡京“私家所藏，多于府库”，据传说他家做一碗羹汤，就用数百只鹌鹑。徽宗赐蔡京一所宅第，用钱达百万贯。

从小说的艺术形象来看，贪官、奸佞、权势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殿帅府太尉高俅。他本来是个无赖帮闲，因踢得两脚好球，受到有同样作风和爱好的徽宗赏识，从而平步青云，爬上高位。这号人一旦大权在握，就要施展淫威，公报私仇，陷害异己，无限度地扩张自己的权势。北京大名府中书梁世杰，为了庆贺丈人蔡京的生日，搜刮十万贯金珠宝贝分装十一担，送上东京，美其名曰“生辰纲”。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在高唐州做知府，怂恿小舅子殷天锡横行霸道。无为军黄文炳企图走蔡九知府的门子爬上去，极尽阿谀奉承、讨好谄媚之能事，蝇营狗苟，屡屡出谋划策，陷害宋江。

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四大奸佞，互相勾结，沆瀣一气，致使国政极端虚弱、黑暗、腐败。异族经常侵犯边境，却无能抵御。小说写到北方辽国兴兵十万之众，侵占山后九州所属县治，蔡京、童贯等人为了贪图辽国贿赂，不惜出卖祖国利益，终于沦为民族的败类。上述描写，表明了蔡、童、高、杨之流，正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黑暗、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

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人，对这些谗佞之徒、误国之辈早已恨入骨髓。他们是权势和金钱的结合体。广大人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奉公守法的禁军教头林冲，尽管逆来顺受，还是被他们害得夫妻离散，家破人亡。无辜的王进，被逼得逃亡异乡。孤苦的金老父女被迫沿街乞讨。连大周皇帝嫡亲子孙柴进，也被逼得走投无路。人民要想生活下去，只有啸聚山林，起来造反。有的图霸称王，想取而代之；有的高擎“替天行道”的旗号，惩恶扬善。反抗的矛头直指蔡、童、高、杨为代表的当朝奸佞，旁及依仗他们横行

霸道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地方反动武装等。

小说中所描写的梁山泊的英雄豪杰，作为人民群众反奸抗暴的中坚力量，和蔡、童、高、杨等奸佞、贪官的矛盾冲突，鲜明地贯穿全书始末，成为《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从发生、发展、高潮再到结局的一条主线。其他非主要情节，如金老与郑屠的矛盾，武大郎与西门庆的矛盾，施恩与张团练的矛盾，等等，也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一基本矛盾冲突来安排和设置的，如同一条长河上的许多支流，最后汇合一起。越到后来梁山泊英雄与蔡、高等奸佞、贪官的矛盾越集中，越明朗。经过几番较量，梁山英雄战胜了奸佞、贪官，有条件地接受招安，看来这个矛盾似乎解决了，给人造成小说分成两截的印象。实际上招安后这个矛盾继续发展，斗争更加曲折、微妙。四大奸佞不断密谋排挤、迫害梁山英雄，直到八十二回童贯出面上奏皇帝，妄想把一百单八将一网打尽，激化了的矛盾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作为故事情节的主线发展到新的高潮。宿元景从旁揭穿阴谋，保举宋江等人北征大辽，矛盾又得到暂时的缓和。宋江班师回来，蔡京等人又百般刁难、排挤，梁山泊英雄自吴用以下都有再反上梁山之意，情节的主线又形成一个大的浪涛。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写梁山泊英雄南讨方腊，可视为全书的尾声。在这后九回里，逐次交代了一百零八个好汉的悲惨结局。每一回末都要特别点明去掉哪几个英雄，情调异常凄凉。即使梁山英雄以十去其八来报答赵官家，幸存的几个仍然逃脱不了被御赐毒酒鸩死的下场。“可怜忠义难容世，鸩酒奸谗竟莫逃。”读到这里，怎不令人掩卷太息——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世界呀！在那个奸佞当道的黑暗社会里，哪有什么真理可言？“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这个主旨，作者已多次点明，第八十五回借罗真人之口预言“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第九十九回又借燕青之口说：“……岂不闻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

落得未央宫前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作者的立意，分明是通过《水浒传》人物不平凡的斗争经历和浓重的悲剧色彩告诫人们，在那个“权奸害忠良”的黑暗时代，根本没有真正的“忠义”可言；皇帝重用奸佞、贪官，诬陷忠臣，摧残良将，镇压人民的反抗，便是引狼入室，招致亡国的直接原因。《宋史》说得好：因为这位昏君徽宗“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①这才招致了“国破身辱”的可耻下场。

作者选择、概括这样的矛盾冲突，给作品带来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就整个封建社会而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矛盾的表现形式又不尽相同。自北宋末年、南宋到元，正是《水浒传》故事广泛流传的时期。这时，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与此相应，在国内爱国忠良和卖国奸佞的斗争也极其尖锐。在这段历史上涌现出多少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有的在朝内与权奸抗争；有的在山林乡里组织“忠义军”，抗击北方异族的统治。同时也出现过一些遗臭万年的卖国贼，贪赃枉法的民族败类。特别是宋徽宗统治年代，由于皇帝昏聩，权奸贪官专权，造成半壁河山沦丧，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可耻的一页。广大人民群众，目睹种种屈辱事件的发生，亲身尝到国土沦亡之痛。他们从实际生活中懂得了“木必先腐而后虫生”的朴素道理。追本溯源，自然而然把丧权辱国之恨倾泻到亡国之君身上。但是，人们又深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总想把皇帝和奸臣、贪官加以区别；尤其在民族存亡之际，更是把皇帝看成国家、民族的象征。于是传统的“忠义”观念便成为

^①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

英雄人物的灵魂。这就是《水浒传》选择宋徽宗时代作为典型环境，而主观上不反皇帝，又在一定程度上对皇帝做了某些揭露的历史原因。这个矛盾，同时也造成反抗者的复杂性格：他们一方面坚决反对奸佞、权势、贪官；另一方面又接受招安，北征大辽，南讨方腊。这一切，固然有作者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

《水浒传》写的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

《水浒传》所颂扬的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是北宋末年到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理想的英雄人物，很难说他们单纯属于农民阶级。艺术的真实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但二者之间毕竟不能画等号。据《宋史》记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① 又说：“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涣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② 但《水浒传》不是历史，而是经过民间流传和作者多次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一部艺术珍品。它所讴歌的宋江等梁山英雄人物，不同于历史上横行齐魏的宋江等三十六人，而是宋徽宗统治时代官逼民反、外患频仍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概括了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所具有的诸如反压迫、反侵略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当然不是农民所仅有的。

会聚在梁山泊的英雄们，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乃至各行各业的人物。他们当中既有农民、渔翁、猎户、樵夫、艄公、车夫、屠户这样一些劳动者；又有铁匠、银匠、造船匠、雕刻匠、裁缝等手工业工人。既有酒家、生药贩、盐贩、

^①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

^②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侯蒙传》。

羊马贩、水银贩、鱼牙子等商贩；又有教员、秀才、落科举子、医生、兽医等知识分子。既有提辖、都头、牌军、教头、统制、都监、知寨、团练使等一般武官、武职；又有和尚、道士、相扑者、要枪棒卖药的闲汉、赌徒、小偷、流浪汉等各种无业游民。既有孔目、押司、管营、押牢节级、刽子手、小牢子等官府衙门中的各种吏役；又有农村富户、城市大户、庄园主、大周皇帝嫡派子孙等剥削阶级的人物。他们共同的命运，就是被蔡、童、高、杨为代表的奸佞、贪官组成的反动统治集团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忍无可忍，只好铤而走险、上梁山共聚大义。在皇帝昏庸、奸佞专权的那个时代里，被迫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只是破产的农民及其他劳动者，而且连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受压迫者的人、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挤和诬陷而不得不投靠到革命队伍里来。这样便形成了一支以梁山泊为根据地的浩浩荡荡的人民革命武装。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梁山泊好汉，由于生活道路不同，教养不同，他们的秉性也迥然有别。在号称一百零八个好汉当中，写得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不下数十人，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鲜明、独特性格的“这一个”，诸如鲁莽憨直的李逵，沉着精细的石秀，豪爽洒脱的鲁智深，淳朴浑厚的林冲，英俊彪悍的武松，灵活机变的燕青，足智多谋的吴用，雍容大度的柴进，心直口快的阮小七，老成持重的阮小二，等等，无不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作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从来不是单纯强调写共性所能奏效的，而是要求寓共性于个性之中，从而达到个性和共性的完美统一。梁山泊蓼儿洼如此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正是作者借助于典型化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个性的生动描绘表现了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即同情弱小，反抗强权，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精神。他们为人光明磊落，大义凛然，重然诺，轻生死，因此处处遭到蔡京、高俅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打击、诬陷和迫害。他们求生不能，反

抗乏力，于是啸聚山林、团结战斗便成了唯一的出路。

从全书看来，这些英雄人物性格的形成大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逼上梁山前，他们主要凭靠个人的正义感、武艺和胆量，与邪恶势力作对。例如鲁达为救护受凌辱的金氏父女逃出火坑，三拳打死恶霸镇关西；继则大闹野猪林，一直把风尘知己林冲护送到沧州。武松怒杀恶霸西门庆为屈死的哥哥报仇：醉打蒋门神，为施恩夺回快活林。李逵“吃醉了时，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可谓“路见不平真可怒，拔刀相助是英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扶危济困，仗义疏财，如宋江向孤独贫穷的人们施舍棺木，柴大官人常常资助流配来的犯人，史进送银子给萍水相逢的金老等。

在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里，个人式的反抗，必然为反动统治阶级所不容，从而受到不同形式的打击、诬陷和迫害。不甘屈服又要坚持斗争，只有上山“聚义”，才是唯一的前途，这就是梁山泊英雄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有力地反抗官府、豪强的压榨、掠夺和迫害，他们三五成群汇集在一起，占山为王，杀富济贫。晁盖等好汉就是“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而后上梁山的。每座山头实际上就是人民武装起义建立的一个根据地。《水浒传》有声有色地着重表现了梁山泊的发展和壮大，同时又疏密相间地描写了其他许多山寨。“聚义”是在仗义的思想基础上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战斗旗帜，是维护团结、一致对敌的思想准则。桃花山头领李忠、周通经不起官军凌厉的攻势，便求助于二龙山。二龙山头领鲁智深不计前嫌和个人恩怨，亲自带兵下山支援，与桃花山协同作战，抗击官军，仗的是个“义”字。为了解救陷入囹圄的孔明及其叔父孔宾，二龙、桃花、白虎等三山人马联合起来攻打青州，当孔亮去梁山泊求救时，晁盖表示：“既然他两处好汉尚兀自仗义行仁救叔，今者三郎（指宋江）和他至爱交友，如何去！”同样仗的是个“义”字。“赖有宋江豪侠在，便将军马救危亡。”

晁盖在这里所说的“仗义”，虽然已经从同情弱小，抱打不平的个人式的反抗发展到山寨与山寨之间的联合抗暴，但是基本宗旨还是“行仁”，即爱民。晁盖曾经说过：“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拼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宋江攻克东平府，将程太守家私，依散居民，并张贴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梁山爱护老百姓的声誉，甚至在江南父老中也广为传诵。王定六的父亲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里似我这里草贼。若得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薅恼”。梁山泊好汉在历数慕容知府、刘高等贪官的罪行中，都少不了残害良民这一条。姑且不论历史上的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是否爱民，小说如此突出梁山泊英雄爱民这个特点，无疑是当时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作品中的反映。

“仗义行仁”又是维系山寨内部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从聚义那天起，他们就过着不怕天，不怕地，“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日子。这样一种自由、平等、和谐的世道，虽然只是作者的美好憧憬，但是，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广大被压迫人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底层的知识分子等）的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

各个小山头的力量，对付不了更强大的敌人，于是他们便自动焚毁了小山头，归并到梁山泊大寨里来。众英雄人人戮力，个个同心，生死与共，患难相扶。梁山泊“列两副仗义疏财金字障，竖一面替天行道杏黄旗”。英雄们的共同誓言是：“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意味深长的是，梁山泊总是把“替天行道”“共存忠义”和“保境安民”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忠义”是这次人民武装起义的灵魂，“替天行道”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保境安民”则是他们的目标和落脚点。正是这个共同的意志激励他们在反强权、反压迫的斗争中两胜童贯，三